

北京市艺术文化学科群建设项目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教材
同济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项目

中国摄影史略

宿志刚 林黎 刘宁 周静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市艺术文化学科群建设项目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教材
同济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项目

中国摄影史略

宿志刚 林黎 刘宁 周静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摄影史略/ 宿志刚等编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1

ISBN 978— 7—5059—6216—3

I. 中… II. 宿… III. 摄影艺术—艺术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J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6935号

书 名	中国摄影史略
编 著	宿志刚 林黎 刘宁 周静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宋建民
责任编辑	朱彦玲
责任校对	朱 军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5059—6216—3
定 价	8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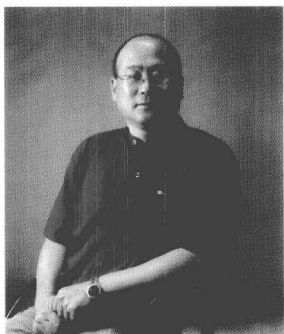
编委会

总策划 籍之伟 张会军 宋建民 宿志刚

主 编 宿志刚

编 委 宿志刚 林 黎 程 檣 曹 颀

朱 炯 吴 毅



宿志刚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教育委员会高教部秘书长。中国新闻摄影协会理事。韩国摄影史研究所亚洲摄影研究客座研究员。曾在列支敦士登、瑞士沙夫豪申市博物馆、德国、日本、韩国等地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2001年10月获得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颁发的第五届中国摄影教育“金像奖”。2002年被《摄影之友》杂志评为2001年中国摄影界十大重要人物之一。2003年10月获得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颁发的“德艺双馨”奖。出版著作十余部，主持并编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系列教材，并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林 黎

同济大学讲师。200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2007年赴德国访问学者。出版《人体摄影技法》、《室外摄影》、《好莱坞肖像摄影解密》等译著，参与采访、编写《镜间对话》一书，并发表论文多篇。

刘 宁

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200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获硕士学位。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解读人身辨认照片》等论文，并完成多项省级课题。

周 静

200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获硕士学位。现居住北京，从事图片编辑等工作。

大家都来抢救摄影史吧

鲍 昆

任何一门学科建立都是有其渊源性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有着坚实的历史支撑。如果我们认为以摄影之名展开，可以构建一种学问的话，那么摄影也是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可能比较复杂，因为摄影是一个有着丰富功能的表现记录媒介。它可以是一部关于它作为工业科学的技术史，也可以是一部艺术的历史，还可以是一部关于新闻传播的历史，当然也可将这一切整合，成为一部由摄影作为话语平台的视觉文化史。但不论它们怎么划分各自成为专门史，在这个史中最主要的主体还是人，是无数以摄影的名义活动的人们。历史的实践是他们，历史的叙事也是他们。所以，钟爱摄影这个名义的人，是应该积极进行关于自己历史的回顾、整理和叙事的。

对于中国的摄影史，我们迄今能够看到文献和专著不多，只有有限的几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中国摄影史》，一部是从1840年到1937年；一部是从1937年到1949年，两部接续的断代史构成了解放之前的中国摄影史。后来，中国摄影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又出版了一本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编撰的《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但这部书不能成为“公正”的“史”，因为此书过于官样文章，有些像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工作史。虽然此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收纳了组织之外的一些现象，文献资料性较强，但因为缺少建立在现代思想学术的分析方法，导致“史观”过于政治化，所以一直不太为人们认可。其实这部“史”还是非常宝贵的，起码为我们更丰富的历史探索提供了坐标性的提示。从这三本书来看，我们就算有了一部中国的摄影史。但这些“史”都过于粗糙，都是比较宏观的叙述，缺少更为生动的例证。《中国摄影史》（1840—1937）是由已经过世的胡志川先生、马运增先生主编，在广泛进行了对清末、民国史料文献的检索研究基础上完成。遗憾的是，这部历史的许多当事人或不在世，或在当时都不是主流人士，未能对该书的书写提供更多鲜活的考证，所以显得粗糙一些。《中国摄影史》（1937—1949）由蒋齐生先生领衔编撰，相对简约一些。由于蒋齐生先生属于从延安走来的革命摄影人士，所

以此书的笔墨更多地侧重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摄影史，对于国统区的摄影介绍相对要弱化一些。但此书资料翔实，因为撰写之时，众多的历史当事人都还在世，蒋齐生先生和写作组成员作了相当多的访谈工作，资料的比对相对要准确得多。

在这三本书之外，后来又有身在山西的革命老前辈顾棣先生和方伟合作撰写的《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老先生是革命摄影先驱沙飞的学生，他不但本身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而且他从参加革命之始就负责资料的整理收藏工作，因此在史料的占有性上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本人也是一个对历史有着高度责任感和极浓兴趣的人，长期坚持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工作，所以他本人就是一部“活历史”。除此之外，一些前辈和机构也以不同角度和方式进行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是1986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吴群先生著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1999年由香港中国书局出版的《永远的四月》、1992年上海摄影家协会编撰的《上海摄影史》，及最近由广东摄影家协会公元先生编撰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摄影艺术志》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摄影史的整理和书写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高等摄影教育开始普及，全国各地众多院校纷纷建立摄影专业，但关于中国摄影史的教材几乎是空白。前面提到的那些摄影史著作大多也已经脱销，而且内容也缺少对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摄影实践的历史性记叙。各个院校关于中国摄影史的课程只能靠教师自己整理的教学讲义，学生不但缺少读本，甚至可读的像样的参考资料也很少。

另外，随着这些年不断挖掘出来的新史料和由于思想知识界新的研究成果，人们对于历史的解读素质也普遍提高了。对于历史的解读人们不再满足于宏大叙事的“通史”，而是希望看到更多原汁原味的史料来自己进行辨析。那种由某些机构组织的，由少数“专家”撰写历史的方法现在显然已经过时。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历史的撰写显然是一种权力，因为无论财力和人力、物力都是昂贵的，比如司马迁时代的简牍就非一般人家可有，于是历史的撰写成为一种分工和专业，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和州县“方志”的撰写人即是。他们拿着供养人的薪俸，按照供养人的意旨著述，撰写的历史必然偏颇。现代以来，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人们书写的权利因之获得释放，历史的书写撰述也由统治者转为民间。大量民间的研究机构和院校担当了这项工作。虽然它还有机构色彩，但毕竟和古代那种带有政治特权意味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现在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和印刷传媒的发达，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书写则越来越具有公众性。互联网也让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流量和流速也越来越快，历史的书写因此简化。但是，书写的便捷也让历史的书写轻率，一些急于成名心浮气躁的人并不

安心踏实地做学问，而是以网络搜索替代严肃认真的田野工作，然后加以简单皮毛的所谓“史观”胡乱阐释和结论，于是以讹传讹就大规模地产生。这是对历史严重的不负责任，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娱乐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必须警惕和反对的现象。网络的历史书写方式一方面颠覆了“官史”的权力叙事，一方面又造成大量谬误的历史书写，所以网络历史书写并不能完全代替严肃的历史写作。针对此种现象，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倡严肃的历史书写态度。

再有，摄影影像是一个高度依赖文字支撑的影像文本，如果没有具体文字信息的附释，许多影像的确切意旨和内涵将会大打折扣，不能形成完整的“历史文本”。近年来，许多历史影像的拍摄者和相关当事人，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甚至不断地远行。鉴于此，对一些影像的具体拍摄情景和背后的故事，以及相关的时代语境的挖掘、整理工作，现在有些显得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抓紧这项工作，相当多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谜案。

由北京电影学院宿志刚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摄影史略》，可以说就是对以上诸般现象的回应。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是国内摄影高等教学的重镇。近年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教学和教材两方面的建设，先后已经组织各种社会力量编撰了多本摄影教材。这次他们又在摄影史方向以课题的方式尝试整理。他们没有好大喜功地进行编年体方式的大历史写作，而是脚踏实地，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断代史和专项分类史的工作。这种治史的方式，恰好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方式，就是避免垄断性的先入为主的“大历史”写作，提倡多角度、多层次的史料信息整理和个性化的研究言说。这样，真正的历史才能丰富多彩地呈现，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祝贺这本书的付梓，虽然它注定还有不少的瑕疵，但它到底打破了多年迟滞不前、沉闷的摄影史撰写局面，为今后局面的展开注入了活力。

是为序。

2008年8月19日

目 录

第一章 经营为先照相馆	1
一、早期照相馆的建立(1846—1900)	1
二、照相馆的成型阶段(1900—1920)	15
三、照相业繁荣期(1920—1940)	18
四、建国后至改革开放(1949—1985)	20
五、影楼时代(1985—2000)	22
结 语	26
第二章 技术改变拍摄	33
一、中国古代对摄影科学的贡献	33
二、摄影影响观察视点	35
三、传统摄影的仪式感	36
四、数码年代中的摄影	40
第三章 百花齐放的二三十年代	46
一、民间的力量：摄影团体	46
二、理论探索：刘半农和胡伯翔	51
三、摄影实践：“南郎北张”	54
四、摄影杂志	59
第四章 艺术探索之人像摄影	71
一、早期的探索	71
二、解放初期	75
三、“文革”时期	80

四、新时期	80
五、自拍像	100
第五章 观念先行之人体摄影	106
一、意识的觉醒	106
二、身体作为一种语言	109
第六章 公共视野内的肖像摄影	132
一、名人肖像	132
二、社会肖像	152
第七章 社会纪实摄影的目光	159
一、前史	159
二、揭幕序演——《人民的悼念》和“四月影会”的实践 ...	164
三、寻根文化	178
四、无主题时代	186
小 结	206
附1 美国纪实摄影的发展	210
附2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定义的发展	213
第八章 广告摄影	218
一、插图广告时代	218
二、广告影像的雏形	220
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广告摄影	222
四、新时期的广告摄影的发展	223

五、广告摄影的新特点	239
第九章 结婚纪念照片	241
一、结婚纪念照与服饰的关系	241
二、结婚纪念摄影的风格变化	247
第十章 时尚摄影	255
一、前时尚摄影时期	255
二、消费时代的时尚摄影	259
三、时装摄影	274
第十一章 女性的视点	285
一、中国第一位女性摄影科学家黄履	285
二、清宫女摄影人	286
三、动荡年代中的女性摄影家	290
四、担当起救国重任的巾帼英雄	302
五、建国后历经风雨	307
六、由一元向多元、由外向内的转变	313
总 结	323
附 录	325
一、部分摄影师介绍	325
二、主要参考文献、作品集	330
过程是快乐的	332

第一章 经营为先照相馆

1839年8月19日，法国全景画家路易·雅克·芒特·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 1787—1851)在法兰西学院公布达盖尔银版照相术的发明。通常，摄影史将这一天定为摄影术的诞生日。1840年，美国人率先在纽约创办了全球第一家照相馆，之后照相馆迅速出现在欧美各地。在科学和商业市场的支持下，摄影得以迅猛发展和传播。首先，实用性较强的摄影实践自觉地发展起来，包括饱含猎奇意味的旅游摄影（一般在较先进、发达的国家率先发展起来）。其次，为各个阶层服务的照相馆摄影遍地开花（较落后的国家也不例外）。

一、早期照相馆的建立 (1846—1900)

1844年，照相馆开始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1843年，法国人于勒·艾吉尔被任命为中国、印度及大洋洲贸易团团长。第二年中法在澳门举行五口贸易谈判，于勒·艾吉尔随法国大使为签订《黄浦条约》来到中国。谈判中，他拍摄了清政

府五口通商大臣耆英的肖像照片[图1]，还拍摄了澳门、广州的城市风景和市井生活的影像。这张耆英的肖像是一张普通的半身像，正是这张照片开启了中国的摄影历史，标志摄影术在文明古国开始传播。

《南京条约》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强行划为通商口岸。此时，摄影术在欧洲已日趋普及。资本



图1 耆英肖像——中国历史上第一张照片
于勒·艾吉尔摄（1844）

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商品，中国照相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外国人率先在开埠城市创建照相馆。随后，各地陆续出现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照相馆。一开始在东南沿海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向北深入，天津、北京等北方城市也先后出现照相业的繁荣。

同治五年（1866），晚清历史上首次派官员出国考察，了解西欧摄影事业的发展情况。抵达英国伦敦后，年轻翻译官张德彝立即去普通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肖像。这张照片成为实地考察当时西欧照相质量的一个有力凭证。同样，他也对巴黎的高级照相馆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对摄影棚内的布置、摄影方法，以及专业的摄影器材等记录在案：上楼“玻璃嵌窗，玻璃照棚”，“另有白布照棚帘帐，以测日光之浓淡，以正照像之黑白。并有琴棋书画，诸多陈设，以及假林花木，山水楼台，一切任人随意布置点缀，情景各臻其妙。”^[1]中国早期照相馆的天光摄影棚就是以此为格局。

1、早期照相馆的社会角色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摄影在西欧国家中朝着更广泛的应用领域蓬勃发展起来，涉及到工厂、医院、收容所、管教所、军队、学校……与此同时，中国清朝宫廷府衙也迅速、自觉地利用摄影手

段，当然多由照相馆承担拍摄工作。不可否认，技术和资金是摄影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当时中国严重贫富分化的情况下，照相机成为封建王室的消遣工具，或者从事商业摄影的专业人士谋生工具。同时，早期摄影设备庞大笨重，且操作工艺复杂繁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摄影术走向普通大众。另外，照相馆除了拍摄商业人像外，还承担起许多图像资料、文献的记录任务，可谓身兼数职：官方档案文献、新闻报道、专题报道、商业用途、艺术创作等等。这也是早期照相馆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比如，1884年，香港东华医院首次拍摄天灾人祸中的死难者尸身相，以供亲属认领。据1891年的《湘报》第140期记载，广州考试考场上发现替考之人，用照片将其示众。1906年，警局将在押犯人逐一拍照，相片悬挂在局前，并注明犯人姓名、罪名和编号，任人观看，以示惩戒^[2]。

照片的功能也开始多元化，渐渐成为官府查考、识别身份的影像证据，以及建立人事档案的重要影像资料。照相馆负责拍摄入党会、投考、执照及护照所用肖像照片。1884年就有作为出境护照的照片。1884年，上海宜昌照相馆拍摄的一位名叫“石昌坤”的人的全身像照片[图2]，照片裱在一张对折卡纸左边，右边下方印有“上海宜昌照相”的中、英文字样，上方空白处画线用英文

[1] 吴群：《晚清人像摄影偶记》，21foto.com网站，2001年6月10日。

[2] 吴群：《岭南早期摄影事业琐记》（下），载于《摄影之友》199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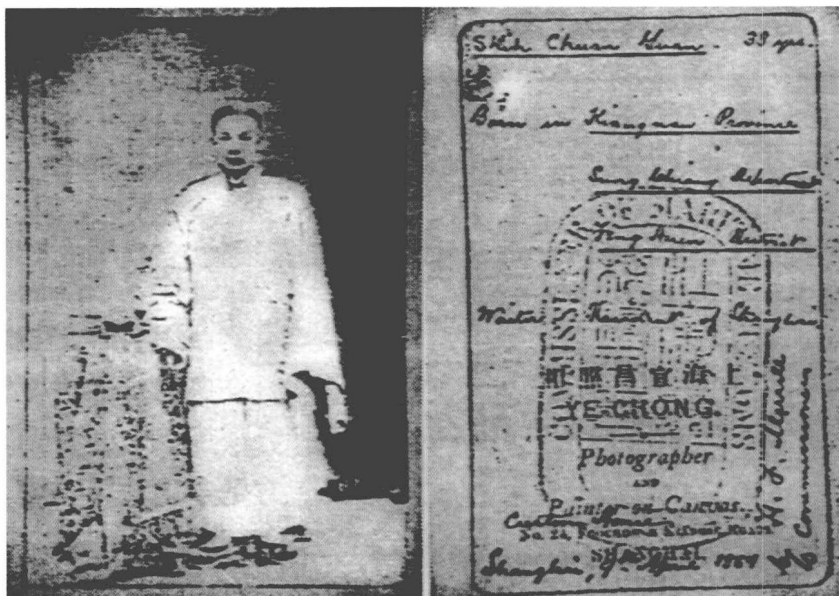


图2 作为出境护照的照片 上海宜昌照相馆摄 (1884)

填写：“石昌坤，33岁，出生江西省奉贤县，服务员”，“1884年4月9日，上海”，还有“H.F. 尤尼利”等人的签名笔迹，并加盖有“江南海关税务司印”的图章^[3]。

光绪三十年（1904），各衙门已普遍用照相来检验真伪，处理人事。例如：外务部要求“考取供事均令一体照相，一合照，一分照，听候传到时当堂呈验，如有人照不符者立即扣除查究”。对各省考取赴日留学的诸生，也要求先“自呈影相二张，以一张存案，一张黏贴咨文尾，加盖骑缝印后封给该生资报，以为查验真伪之据”。在故宫博物院的库存文书资料中，尚能看到

《王大臣官弁亲兵照像》一匣，内有标题“统领奉军记名提督左宝贵”，“统领北洋水师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山东巡抚张曜”，“四川提督宋庆”等人的正面全身相片数十幅。在明清档案馆还保存着几本厚厚的《门照相册》，每页贴四寸半身人像四张，每张上方均有编号，两边分填职称、姓名、年岁、籍贯，将清末各宫殿房处署的总管、带班、首领、大小太监和勤杂员工一一排列，显然是内务府分门编制的人事照相花名册。这些都可是宫廷利用相片存档的实证^[4]。

中国的照相馆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经营的性质。它们的经营范围也随着社

[3] 吴群：《上海早期的摄影者及其人像作品》，载于《人像摄影》1988年第1期。

[4] 吴群：《清末的记事照片册》，21foto.com网站，2001年6月10日。

会的需求而随时改变。政府的需求成为其中不可少的盈利增长点。比如，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上连续刊登“镜明女子影相馆”和“镜芳”照相馆专拍“入党相、领证相”的营业广告^[5]。

另一方面，摄影也应用于各类专题的拍摄，并将照片制作成记事册。这种清朝记事照片册现存于北京的几个收藏单位，数量大概有二三十种之多，大都采取手工晒印和裱贴照片的方式。这些照片基本上是照相馆负责拍摄、制作完成。有的记事照片册由官方特制，呈献朝廷。清末，这类特制的记事照片册大量涌入宫廷，成为反映当时军政建设事务、工矿企业建设、军事演习、外事礼宾等状况的实证资料。

清末，照片能够如实地反映现场状况，记录实物的特点，日益得到官方的重视，它成为报道新闻事件的资料，向上奏表报功的新型工具，其表现形式和功能相当于现在的专题摄影报道。例如，《广东制造军械厂各厂机器图》选收照片较多，分订为弹厂、枪厂、场屋全图，共三册，册面一侧印有“羊城十八甫黎镛摄影”小字。摄影师黎镛当时在广州开设照相馆，不仅在照相馆内拍摄人像，也到工厂去拍摄现场机器照片，并承揽各种记事照片册的摄制业务。

当然，一部分记事照片册属于各地照相馆自产自销，既可面向官方机构，也在民间市场上发行。它的拍摄题材繁

多，制作美观、朴实，不拘一格。如摄制于1909年的大型专题摄影集《京张路工摄影》，用八开装贴相簿分编两册，每页贴裱十二寸照片一幅，详细地记载了兴建铁路的状况。上册为修筑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等人的肖像、各车站、隧道、桥梁施工完成等照片八十六幅，下册为京张铁路通车、清官员亲临、南口庆祝茶会等照片九十幅。

民间照相馆所拍摄、制作的记事照片册，其拍摄主题多样化，工作方式更为灵活，大都能够深入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如实地报道新闻事件。另外，在照片旁附上图片说明，将照片所无法叙述的细节以及背景资料，用文字的方式补充说明。每幅照片的图片说明均灵活地写在照相底版的一角，通过印放直接显现在照片上，如“青龙桥车站西上下火车同时开行由南望景”标题在照片左下角，“南口茶会”标题在照片右下角，黑底白字的标题不仅美观而且醒目。一方面，省去逐页书写标题的工序，为大量复制出版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使得照片和文字成为一体，显示出图片与文字相辅相成的特性。这一照片册的封里，裱贴着两小张印签：“同生照相号：本号精究放大时装照像铺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3052号”和“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开在虹口西武昌路”。这无疑就是该图册摄制者特意刊登的商业广告。《清西太后丧事录》是北京瑞华照相馆摄制的记事照片册，

[5] 吴群：《岭南早期摄影事业琐记》（下），载于《摄影之友》1992年第3期。

内贴十二寸照片二十六幅，均为慈禧太后出殡时在紫禁城后门外路边摄取的部分场景。有伫立在景山前街的清廷仪仗队阵容、精制的大型纸人纸马，以及各种冥器和祭奠用品等，记录了皇家穷奢极侈大办殡葬礼仪的景象。《西湖各景》为浙江杭州西湖二我轩照相馆摄制，全册共贴西湖风景照片四十八幅。宣统二年（1910），此记事照片册参加农工商部主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展览，获得了农工商部颁发的金牌奖和都察院副都察御史加颁发的奖状。畅销国内外，现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也收藏了这一照片册。还有不少是以配套的单幅照片的形式发行，如表现地方机构建筑风貌的《广州将军府邸》、《广东府台衙门、巡抚部院》等，单独裱贴在硬卡纸上配套销售，卡纸下角还印有“粤东卫边街谢耀华照相，精巧放相”，“镒昌照相·太平门口太宁街”的广告商标。

清末记事照片册可谓琳琅满目，但多数在长期的灾祸动乱中焚毁散失了^[6]。从拍摄方式以及表现形式而言，由照相馆负责拍摄、印制的记事照片册，具有现代新闻摄影的很多特点。但是，受到印刷条件与传播媒介的限制，使得这类照片的传播范围并不广泛。

1901年，上海的《大陆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11幅照片，这被认为是开创了国内报刊使用照片之先河。随着报业

发展，对照片的需求增大，但摄影记者队伍的建设却相当滞后。当时摄影设备所限，拍摄现场活动照片较为困难，所以新闻照片大部分是新闻人物的肖像。因此，照相馆的人像照片仍然受到报界的重视，时常为报章刊用。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的《东方杂志》月刊，每期均选用若干中外名人的照片，制成照相铜版向读者介绍。它在第一、二两期刊登了清廷权贵庆亲王、恭亲王、伦贝子、振贝子等人的半身肖像。辛亥革命爆发后，它又在第八、第九期及时刊出革命党人孙文、黄兴、唐才常、史坚如、吴樾等人的特写像。直到30年代，各报社开始聘用专职摄影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建立了中央通讯社，下设摄影部。但照相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光环，它仍为报刊提供新闻事件、人像合影和肖像特写等照片。

当然，照相馆最基本的经营范围始终是为个人拍摄纪念性人像照片。照相馆事业之所以持续发展有赖于人们试图保留流逝时光的美好理想，或者借以纪念情感的需求。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前，人们是靠“影像铺”这样的店家用传统的画像方法描绘自己的容貌。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为“影像”。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像”。可见人们早就认识到摄影的记忆留存的功能和价值，包括情感意味。

[6] 吴群：《清末的记事照片册》，21foto.com网站，2001年6月10日。

2、早期各地照相馆的形成状况

19世纪7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的照相业初步形成，逐步取代了影像铺。较早开设照相馆的也是那些转行到摄影的画师。据香港博物美术馆考查：“摄影术发明后，香港早年威灵顿街的画像业务，就逐渐受到摄影威胁”，“到了1870年摄影已代替绘画，来永远保存人的颜容及记录地方的外貌。”在香港，新兴的照相和古老的画像交替年代是1870年左右。在我国其他各大通商口岸和城镇，照相兴起和画像衰落大体上也是这个时期^[7]。在经济不发达的中国，照相机没有普及之前，甚至在摄影设备落后的情况下，个人摄影肖像开始普及到每家每户。民国初年（1911）照相业已深入我国农村。

（1）广东、香港

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最早出现在广东和香港。1846年，香港报纸上有一则广告：“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有香港及中国（内地）彩色与黑白照片出售”^[8]（当时彩色照片的工艺暂无从考证）。

“广东省是国内摄影最先发达的地区，而广州更是国内最早一批职业摄影师的诞生地。这些摄影师中不少人都曾在照相业发展较早的香港学习摄影

技术，学成后很多人回广州创业。”^[9]由于交通越来越便利，照相业也随着广东摄影师的迁徙而被带入其他城市、地区。

罗以礼（1802—1852）在广州十八甫开过照相馆，后因台风毁店，返回乡下，他有自拍像（大约1850）等照片传世。咸丰年间（1851—1861），广东人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迁居香港，合伙开了家叫“宜昌”的油画店，后来跟外国人学习湿版照相法。随即合资改营照相馆，仍叫“宜昌”。经营几年后大有盈余，就分途前往各地开店营业，店名皆取“宜昌”。1859年，广东人赖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店门前挂着“摄影家赖阿芳”的巨幅招牌，引人注目。赖阿芳为欧洲游客拍照，也拍摄风光照片，制成工艺纪念品向旅游观光者出售[图3、4]。1869年，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1837—1921）在香港皇后大道与赖阿芳毗邻开设一间摄影室，拍摄人像和出售香港风景照片。粤人温棣南向来香港的美国人习得摄影术，于同治年间（1862—1874），在其父营业于香港大新街的布匹店（名缤纶）开设照相馆。当时“干版尚未发明，所用者仅湿片与蛋白纸而已”^[10]。海南人梁海初香港学艺后，在广州创立“芙蓉”照相

[7] 吴群：《晚清人像摄影偶记》，21foto.com网站，2001年6月10日。

[8] 彭永祥、李瑞峰：《中国摄影史话》，载于《大众摄影》1981年第7期。

[9] 王继雄：《上海早期照相业里的广东人》，载于《新民晚报》2007年11月27日。

[10] 马运增、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9页。